

阿拉伯雄师

——纳赛尔

点评：

埃及总统纳赛尔是拉伯民族主义政治家。中学时代曾组织和领导学生反英示威，数次入狱。20世纪40年代中期筹建“自由军官组织”，1952年，领导该组织推翻了埃及法鲁克封建王朝，赢得了“七月革命”的胜利。埃及共和国成立时，任政府副总理，次年任总理。从1956年到1970年去世前一直担任埃及总统。1956年7月26日宣布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10月，英国、法国、以色列联合进攻埃及，苏伊士运河战争全面爆发。纳赛尔领导埃及人民英勇打击侵略者，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同时，纳赛尔本人也获得了阿拉伯世界广大人民的一致爱戴，被人们尊称为“雄狮”。

纳赛尔还是著名的国际政治活动家。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参加了万隆亚非会议，并和托托、尼赫鲁发起不结盟运动。他为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和亚非人民团结反帝斗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纳赛尔堪称埃及现代史上最具魅力的政治人物。

投身学生运动坐牢负伤

埃及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殖民者在这片土地上为所欲为，把埃及当做自己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但是顽强的埃及人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抵抗，他们同英国殖民者进行了殊死的斗争。随着一战的结束，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埃及人民掀起了反英浪潮，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也岌岌可危。

在这世界风云变幻的伟大年代里，一批争独立、求解放的新的民族主义英杰，在尼罗河赐予的土地上相继降生。其中的佼佼者，当属于 1918 年 1 月 15 日诞生的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纳赛尔出生于地中海之滨的亚历山大城，它是公元前 332 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入侵埃及时兴建起来的一座古城。在纳赛尔出生时，亚历山大城已经是埃及的第二大城和最大的海港，交通发达，繁华兴旺。然而，纳赛尔家居住的培科斯区，则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偏僻地区。纳赛尔家住的是土路旁的一所破旧的泥砖房。他父亲是邮政局的一个办事员，收入微薄，生活艰难。纳赛尔的父亲是个顽固的守旧派。他原是上埃及亚西乌特省贝莫尔村人，属于赛义迪氏族。这个氏族的人，一般都身材高大，面色

黝黑，性情高傲，易于激动。纳赛尔的母亲，是亚历山大一位商人的女儿。她性情温柔，谦逊善良。纳赛尔从小就同父亲合不来，而对母亲则是十分热爱的。长期以来，他们家一直保持着农民的生活习惯。纳赛尔当总统后，为了保持同农民的联系，曾要求政府出版物把他的出生地写为贝尼莫尔。

纳赛尔从幼年开始，就离开父母，过着颠沛的生活。在入小学之前。他被父亲送到了尼罗河三角洲的哈特蒂贝村。在这里，他开始上小学。在他七岁时，学校老师教他们要相信地狱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但又说所有的儿童都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天堂。小加麦尔听了之后，就同另一个孩子商定，为了将来不到地狱去受苦，决定自杀。他曾听父亲说过，火漆是有毒的。于是，他们到邮局偷了一些火漆，吃下去后，就躺下等死。但是，他所得到的不是升入天堂，而是闹肚子，并且挨了父亲的一顿痛打。第二年，纳赛尔被送往开罗上学，同他的一个叔叔住在一起，这个叔叔刚从英国监狱里释放出来。叔叔给他讲了许多英国人欺压埃及人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对英国人仇恨的种子。在开罗期间，纳赛尔曾多次给他所热爱的母亲写信，但一直没有得到回信。等到放假回家时，才知道母亲去世了，父亲已经另娶。刚满八岁的小加麦尔泣不成声，悲痛欲绝。不久，父亲又把他送到亚

历山大外祖母家中继续读书，直至中学毕业。

纳赛尔勤奋好学，从不满足于课堂所得到的知识。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从中学时代开始，他就博览群书。从《古兰经》到历史人物传记，从法国的启蒙思想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无不进行探讨。他读过伏尔泰、卢梭、狄更斯等名家的著作，看过亚历山大大帝、恺撒、拿破仑、俾斯麦、甘地等人的传记。他对历史很感兴趣，对于德国的统一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近现代史、埃及人民斗争的各种事件，他都认真研究，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他读过的有关革命的小说，对他后来的立身处世，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比如，纳赛尔读了描述法国大革命的小说《双城记》之后，更加憎恨残暴的封建贵族；但书中对革命暴力不适当的渲染，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某些评论家认为，纳赛尔的“这个印象，使埃及人民在他们自己国内革命之后，免于了一场重大流血。”《深红色的紫罗兰》这部小说，也使纳赛尔爱不释手。他对于书中描绘的那个领导革命而自己又不出面的地下无名英雄非常崇拜。这本书对他的影响之深，也是一目了然的。1952年革命时期，他自己退居幕后，拥戴纳吉布将军到前台作头面人物，就是最好的说明。

通过大量的阅读，纳赛尔的民族主义思想达到了非比寻常的成熟程度。早在17岁时，他在写给一位

朋友的信中，就表达了对埃及民族命运的深切关心和忧虑。他写道：“埃及……是处于无可救药的绝望状态之中。谁能消除这种感受？埃及政府是建筑在腐败和徇私上的……谁敢向帝国主义者高喝一声‘止住’？埃及是不乏具有尊严的人的，他们不能听任自己像狗一般地死去。但是重建国家，使软弱和受屈辱的埃及人民能够重新站起来，像自由和独立的人们一样生活的人，在哪儿？尊严在哪儿？民族精神在哪儿？……我们的民族像穴居的人一样沉睡着。谁能唤醒这些甚至连自己是些什么人也不知道的可怜虫？”

在纳赛尔的思想中，驱逐英国占领军，实现政治独立，推翻封建王朝，实现政治民主的大方向已经确定。但是应该从何着手，应该通过什么道路来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呢？这个问题，使年轻的纳赛尔一时困惑不解。他想从他学到的知识中寻找答案，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探明一条前进的道路。

纳赛尔中学毕业后，就开始去寻找可以使他脱离家庭的一种职业。他设法去投考警察，并通过了各种考试科目。但是由于他父亲的社会地位低下，未能被录取。一位具有将军头衔的考试委员会主任问他：“你父亲是做什么的？”纳赛尔回答说：“是邮局里的办事员。”于是，这位主任就告诉他说：“我的孩子，这里你不合适。”这次碰壁，使年轻的纳赛尔对旧的等级制度更加痛恨了。

正是这些客观的和主观的条件，使纳赛尔从小就产生了强烈的反英情绪，并逐渐成为一个旧秩序的坚定不移的反对者。他在《革命哲学》一书中写道：“在我童年的时候，每逢我看见一架飞机在天空出现，我就高声喊道：‘主啊，全能的主啊，让英国人遭劫吧！’”在十五岁那年，纳赛尔第一次被卷入政治漩涡。一天，他在街上行走，碰到示威队伍与警察发生冲突，就不问缘由地加入了群众的战斗，因而被捕入狱。在监牢里，纳赛尔发现自己的同伴多是青年埃及党人，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个组织。出狱后，他曾为该组织偷卖杂志等。

1935年，他以中学生联合会主席的身份领导了复兴中学的示威游行，要求英军撤出埃及，恢复1923年宪法，并提出了“要求完全独立的”的口号。他还同学生代表们一起走访了一些“政治领袖”，要求他们“为了埃及而团结一致”。在这次游行中，因与军警发生冲突，有两个学生被枪杀，纳赛尔也因一颗子弹擦过前额而负伤，留下了一个终生的光荣痕迹。

从此，纳赛尔已由一个无知无识的孩子成长为一个热诚的青年民族主义者。虽然他也曾读过《共产党宣言》，也曾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但是由于他的阶级局限，由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以致他始终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反对者。

精心组织自由军官运动

驱逐英军，实现民族独立，推翻封建王朝，实现政治民主，这是纳赛尔的目标和追求。但是应该从何着手，应该通过什么道路来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呢？这个问题，使年轻的纳赛尔一时困惑不解。他想从他学到的知识中寻找答案，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探明一条前进的道路。

中学毕业后，他曾幻想能成为一个法学家。他以为只要恢复宪法，健全法制，就可以使埃及由贫弱变为富强。因而，他孜孜不倦地攻读了大量法学著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又觉得国家自由富强的实现，不能等待，要靠“积极行动”去争取。只把“积极行动”写在纸上，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一个时期内，他也曾经认为热情就是“积极行动”。只要自己有热情，只要能把别人的热情鼓动起来，就能实现革命的目标。他曾挨门串户地拜访了一些“政治领袖”，希望他们能为祖国的独立制订一个统一的政策。然而，这些人的行动表明，他们不是要摆脱英国的控制，而是要继续接受英国的支配。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纳赛尔曾经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华夫脱党人身上。他对该党的创始人扎格卢勒十分崇拜，甚至在 1952 年 7 月革命中，他曾使用了扎格卢勒作为自己的化名。华夫脱党，原意是代表团，其创始人为萨阿德·扎格卢勒。1918 年，扎格卢勒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向英国驻开罗高级专员请愿，要求去伦敦陈述埃及独立的要求，但遭到英国人的拒绝。翌年，他又率代表团前往巴黎，在凡尔赛和会上要求承认埃及独立，也遭到和会签字国的拒绝。当扎格卢勒继续在埃及进行革命宣传时，英国人竟将他本人及其主要支持者流放到遥远的马耳他。后来，英国人迫于形势，在 1922 年让埃及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地位。1923 年，埃及制定了宪法。1924 年，华夫脱党人终于上台执政。但是，英国很快又利用驻埃英军司令被刺事件，压迫华夫脱党人辞职。三年之后，扎格卢勒在郁闷中去世。他的副手哈纳斯继承了扎格卢勒的职位。但华夫脱党在扎格卢勒死后，已经蜕化变质，许多封建大地主混入领导集团，使它逐步由一个比较进步的资产阶级政党堕落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工具和英国殖民者的走狗。随着扎格卢勒的逝世，华夫脱党的反抗和献身精神已荡然无存，它更多地倾向于妥协而不是斗争。1936 年，华夫脱党人再次上台组阁，但它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诱迫

签字放弃独立、接受英军至少在埃及再驻扎 20 年的条约。显然，埃及离真正的独立仍然十分遥远。

在华夫脱党人丧失革命气节以后，埃及也曾出现过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组织，如哈桑·巴纳在 1928 年创立的穆斯林兄弟会。但这类组织的好斗和煽动宗教狂热的特征，对纳赛尔没有什么吸引力。

经受了这一打击之后，纳赛尔认识到“拼命叫喊并不是力量；真正的力量是在于利用我们手中的一切条件做出积极的行动。”他认为“如果应该拯救我们祖国的前途，那么，政治暗杀就是我们所不能不大胆采取的‘积极行动’。”于是，他们就像侦探小说中所描述的“英雄”人物那样，日以继夜地开展活动：安排联络暗号，制定行动计划，并打算先处死几个祸国殃民之徒，然后杀掉国王及其侍从。但是，在采取了一次行动之后，他对这种做法又产生了怀疑：“消灭了这个人或者那个人，难道就能改变我们祖国的前途吗？”经过反复思索，曾经在他的脑海里激荡过的那种政治暗杀的想法渐渐淡漠了。

在这段时间里，纳赛尔重温了埃及的古代史和中世纪史，并着重研究了埃及 1919 年革命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埃及的社会现实。最后，他终于作出了自己的结论：“控制住军队，我们就可以取

胜。”他相信，军队是能决定埃及命运的唯一力量，它可以使国家得到解放，人民获得自由。纳赛尔指出：“局势需要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的成员能够团结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一切个体和阶级斗争，这种力量应该是来自人民内部，它的成员互相信任，而且应该掌握足够的物质力量，以保证敏捷而有决定性的行动。只有陆军符合上述的条件。”

因此，纳赛尔积极设法投考开罗皇家军事学院。在1936年前，这个学院一直为王室贵族所把持。1936年条约签订后，埃及政府为了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着手扩充军队。这样，就为那些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子弟打开了军事学院的大门。所以，象纳赛尔、萨达特等出身寒微的一代爱国青年，就是在1937年3月被招入军事学院的。尽管纳赛尔属于黑名单上的人物，但是由于招生委员会主任海里少将极为欣赏这个青年人的品格和才华，就把他招收进来了。从此，纳赛尔就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在学习期间，他不仅阅读了大量的军事、政治和历史著作，而且对阿拉伯世界的各种问题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同时，为了了解国际事务，还下苦功学通了英语。因为学习刻苦，成绩一贯优异。1938年7月，纳赛尔以少尉军阶毕业于军事学院。毕业后，他被分配

到谢里夫山脚下的曼卡巴德军营。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军官，他们经常讨论埃及的社会政治情况，并制订了他们的《曼卡巴德宪章》，它要求自由军官们必须为重建祖国而永远保持团结和友谊。1939年，纳赛尔为实地考察英埃共管的兄弟之邦苏丹，主动要求参加陆军第三营到苏丹驻防。在他离开曼卡巴德军营那年，萨达特组织了第一个秘密的自由军官组织，共有七、八个人参加。

萨达特的自由军官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采取了与德国人合作，以谋求埃及独立的方针，结果遭到了英国殖民者的残酷镇压。1942年10月，萨达特及其同伴相继被捕，罪名是刺探军情。他还因此被开除军籍，投入监狱，直到二战结束后的1950年才又重返军营，加入自由军官运动的行列。

1942年7月事件的爆发，激发了埃及军人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也使纳赛尔下定了驱逐英国人，解放埃及的决心。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41年，德国军队在北非登陆，直逼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形势十分危急。英国为了保护它在埃及的利益，要求法鲁克国王改组内阁，让华夫脱党的首脑哈纳斯上台执政，以接替无所作为的西里内阁。国王断然拒绝。于是，1942年2月4日，英国驻埃大使兰普森在英国坦克的保护下来到王宫，当面向

国王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国王同意英国人的要求，否则将废黜国王或让国王自动退位。国王当时的反应是，宁愿退位而不愿屈服英国人的要求。但在英国的压力和亲近大臣的劝说下，被迫答应让哈纳斯组织政府。这就是埃及现代史上有名的“逼宫事件”。这个事件暴露了国王一伙对英国人卑躬屈膝的丑恶嘴脸，激起了自由军官的民族义愤，也埋下了 1952 年 7 月革命的种子。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革命的名义领袖，当时就曾致函国王说：“我以穿着这套制服感到羞耻……我要求准予辞职。”而加麦尔·纳赛尔则作出了更加积极的反应。“逼宫事件”发生时，他当时正在苏丹，但他的心情与国内自由军官是一样的。他在苏丹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悲愤地写道：“一接到你的来信……我几乎连肺都气炸了……至于陆军，也感到极大的震惊。在此之前，军官们还只谈他们怎样去寻欢作乐，而今他们却在谈论着为了自己的荣誉而牺牲生命……这一事实教育了他们，使他们懂得有一种必须保卫的东西，这就是尊严。”在另一封信中，纳赛尔还指出：“一旦帝国主义认清，有许多埃及人准备流血牺牲，用武力抗拒武力，他们就会像妓女遭到拒绝那样狼狈地退却。当然，这是帝国主义的情况，或者是帝国主义的习惯。”“至于军队……军官们个个摩拳擦掌，准备为祖国的尊严贡献自己的力

量，以至生命……明天，对于盼望他的人来说，是很快会来到的。”

同年 12 月，纳赛尔从苏丹返回祖国。次年担任了皇家陆军军事学院的教官。1945~1948 年阿以战争爆发以前，他在开罗陆军参谋学院学习。1942~1948 年间，他集中精力抓了自由军官运动的组织工作。由于萨达特等人已被捕，纳赛尔成了自由军官运动的当然领袖。

1943 年 2 月，当纳赛尔以上尉军衔被任命为陆军军事学院教官时，他就开始着手在自由军官中建立支部，以便在将来行动时，能够领导埃及实现完全的独立。1946 年，纳赛尔向自由军官们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其要点是：1. 在军官中间制造舆论；2. 使军官们懂得自己肩负的爱国主义职责，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3. 逐步提高军官们的政治觉悟，使他们在拯救祖国的战斗中发挥作用，或者至少在被派往执行任务时保持中立，不与人民为敌；4. 争取军官们不受时间的影响，不单独或集体作任何没有理智的事，也不采取任何轻率的行动；5. 教育军官们保持独立思考，个人和集体不得和军队以外的任何团体、党派挂钩，军队是一个重要的部门，应该始终掌握在有把握局势的人手中，不能成为某个人或某个团体手中的工具。在他的积极领导下，秘密小组日益增

多，几乎遍及整个武装部队。

1948年5月，阿以战争爆发后，纳赛尔在自己的家里召开了一次自由军官委员会会议，研究了对这次战争应抱的态度。他们认为，从军事角度来看，埃及尚未作好准备，不应参战。但是当其他兄弟国家都在为保卫阿拉伯心脏地带而做出贡献时，埃及置身事外，也是不光彩的。参加作战，便于在军队中发展自己的组织。于是纳赛尔就放弃考试，同其他几个青年军官一起参加了巴勒斯坦战争，任营参谋长。在战斗中，他显示出智勇双全的本领。战争初期，纳赛尔腹部受伤，被送回国内治疗。在开罗医院住了不久，他又重返前线了。1948年10月，纳赛尔和他所在的一个旅被敌军包围在法卢贾的一个孤立据点里，他指挥部队采取防御战和运动战等方式，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一次，以军从两处突入埃军阵地，纳赛尔率领士兵激战五小时，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解除了全军覆灭的危险，获得了“法卢贾之虎”的光荣称号。当时，他还到前沿阵地向以色列士兵喊话，揭露敌人的劝降阴谋，瓦解敌军，坚守阵地。1949年2月停战协定签订后，埃军顺利回国，受到埃及人民的热烈欢迎。在这次战争中，纳赛尔由于战功卓著，曾两次获得奖章，并被提升为少校。这场英勇的保卫战，使纳赛尔想到了很多。他在被围困的据点里，有时同战友们促

膝谈心，有时自己独坐遐想，感到埃及军队被人送进一场自己毫无准备的战争里，埃及的命运被贪婪、阴险和荒淫无耻的人物所玩弄。尤其使他感到气愤的是，战争中所揭露出来的最高军事指挥部的无能以及负责医疗设备和武器供应部门的腐败，据说国王与此事直接相关。这使纳赛尔得出结论，除了赶走英国人之外，还必须首先打倒它在埃及的社会支柱——法鲁克王朝。同时，他还认识到，阿拉伯国家应当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他说：“既然地区是一个，大家的处境又相同，所遇到的问题和前途也相同，敌人又是一个（不管他怎么样伪装），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分散我们的力量呢？”

在 1942 年英军逼宫时，纳赛尔的目的和抱负主要还只限于驱逐英国人这一点上，但 1948 年战争之后，他又进而认为要赶走英国人，必须首先打倒它在埃及的社会支柱法鲁克王朝。国内革命的迫切任务，已提上了“自由军官组织”的议事日程。

“七月革命”推翻封建王朝

埃及“七月革命”，与以往的军事政变不大一样，在形式上是以政变形式爆发的一场反对殖民入侵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声势浩大的革命。这场革命的爆发，不是偶然的，除了众多的现实原因外，还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早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埃及大地上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民族国家。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金字塔，代表了埃及远古时代的光荣。但是，从公元前 6 世纪开始，由于埃及占有欧亚非三洲要冲的战略位置，它先后沦为波斯、希腊、罗马、拜占庭、阿拉伯、库尔德和土耳其人侵略、蹂躏的对象。

进入近代以后，特别是 1869 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后，埃及又成为英、法等西方列强角逐的场所。1882 年，英国镇压了阿拉比起义之后就占领了埃及，埃及遂沦为英国的殖民地长达 40 年之久。1922 年，英国不得不承认埃及名义上获得独立，但仍在埃及保留许多重要的特权。这些特权集中体现在 1922 年英国《二月声明》中附有的结束

“保护”的“四个保留条件”，即埃及的外交须服从英国指导；英国保有在埃及的驻军权；英国在埃及有保护外侨权；英国对苏丹的最高统治权不变等等。1936年5月，英国为了延续其对埃及的殖民统治，再次诱骗埃及政府签订了为期20年的《英埃同盟条约》。该条约的主要内容是：英国负有保护埃及不受外国侵略的责任，埃及在战争时置于英国的管理之下；英国终止在埃及的军事占领，但在平时英国仍有权在苏伊士运河驻军10000人和飞行员400人，运河的营房建筑费由埃及政府承担；英国空军有权在埃及的上空不受阻碍地飞行和使用埃及的飞机场；亚历山大在8年之内保留为英国海军军港；埃及可以建军，但一切武器须向英国购买，英国向埃及派遣军事代表团，负责训练埃及军队，埃及军队不得接受其他国家的训练，埃及军官出国学习，只能派到英国；恢复1899年《英埃共管苏丹协定》，允许英国军队重新开入苏丹；英国同意取消外国在埃及的领事裁判权，并将会同其他国家一起与埃及政府另行商谈。这个同盟条约是英国人强加给埃及的，其实质是在承认1922年英国提出的“四个保留条件”的基础上，肯定了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区的驻军权。英国的上述卑鄙行径，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埃及人民的反对，英国殖民者与埃及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了当时埃及社会的主要矛盾。